

基于符号学的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景观更新研究

Renewal of Memorial Landscape to Nanjing Massacre Based on Semiotics

戴安康 刘源*

DAI An-kang, LIU Yuan*

摘要: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让一系列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碑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但作为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历史文化传播方面却已略显乏力。基于符号学理论,对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进行解构,研究了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分析了成因。将符号学方法与景观设计原理结合,从纪念性景观构建中的符号选取、主题强化、信息传达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的具体更新方法。并以南京普德寺丛葬地纪念性景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 纪念性景观; 战争遗址景观; 符号学; 南京大屠杀; 景观更新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641 (2021) 06-0049-05

收稿日期: 2021-05-20

修回日期: 2021-06-29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Memorial Day makes a series of monuments to Nanjing Massacre return to public view. Bu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y have been weak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iotics,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memorial landscapes to Nanjing Massacre, studies their actual problems and analyzes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Combining the Semiotics methods with the landscape design principles, the paper discusses specific renewal methods of the memorial landscapes to Nanjing Massacre from the aspects of sign selection, theme enhancement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morial landscape,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the memorial landscape at Pude Temple to Nanjing Massacre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Memorial landscape; Landscape of war sites; Semiotics; Nanjing Massacre; Landscape renewal

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碑是基于南京大屠杀事件遗址和丛葬地建立的一系列纪念碑,是人们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寄托哀思、以志悼念的重要方式^[1]。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市先后建设了21座纪念碑,然而这些纪念碑在建成后大多经历过漫长的沉寂。本文从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的景观构成模式入手,基于符号学理论,剖析纪念地现存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索强化纪念属性、重唤场地活力的景观更新设计方法,为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建设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

1 概述

1.1 纪念性景观

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纪念性景观就已参与到城市景观构成之中,这点从罗马的记功柱和广场中可见一斑。随着社会文化发展,纪念活动的

公众属性逐渐取代精英属性。刘滨谊^[2]提出,纪念性景观包括用于标志某一事物或为了使后人记住的,或能够引发人类群体联想和回忆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或文化遗迹的物质性或抽象性景观。孟萌^[3]将纪念性景观定义为一种对人或事件表示怀念以及传承历史的综合区域环境。综上,本文作出如下定义:纪念性景观是为纪念人物、事件、历史时期或者一种文化或精神而建造的艺术化的人工环境。

现今的纪念性景观,是城市景观的有机组分,是城市记忆的展示窗、城市文化宣传的景观载体,其为公众提供纪念和游憩的场所^[4],与政治活动产生相互作用^[5];同时,城市历史与规划也影响着纪念性景观的建设与发展。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终生残疾老兵纪念碑既是纪念活动、政治集会的重要场所,也时刻警示着不远处的进行战争决策的国会。广场以象征美国军队的五角星形水池与白色纪念

墙构成主体;图文兼并的玻璃墙与青铜剪影错位拼贴,讲述着战争的故事;在老兵节前后凋落的银杏作为基调树种,成为重要的纪念符号。

战争遗址作为历史遗存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却常常在城市建设与公众生活中被忽视^[6]。建立战争遗址纪念性景观是保护战争遗址的重要手段。张洪恩等^[7]将战争遗址景观的规划手法分为抽象的场景再现、具象的历史还原和抽象具象结合的叙事手法;G.E. Johns等^[8]以明尼苏达州的达科塔-美国战争纪念性景观为例,阐述了基于叙事性路径串连城市中战争遗址的设计手法。对于在血泪与抗争中崛起的中华民族来说,战争遗址景观具有传承记忆、警示后人的重要作用。正确评估与保护战争遗址景观对保持历史记忆完整性意义重大^[9],提升战争遗址景观的社会影响力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途径。

1.2 符号学视角下的纪念性景观

符号是表达意义与理解意义的必须且独一无二的工具，符号学即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其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10]。符号学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最终随着皮尔斯的开放模式的发扬光大，符号学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学科^[11]。在风景园林学科领域研究中，利用符号学方法能够清晰地分析景观结构和设计语言，研究景观元素与主观体验间的联系等，从而为各种类型景观资源分析和景观设计提供通用而完善的研究路径。

符号学为纪念性景观的纪念意义表达研究和设计方法探究提供了思路。李成佳^[12]阐述了纪念性景观的语构学和语义学特点，以及语用学对纪念性景观设计的影响，并从符号学视角分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景观设计；何文秀^[13]阐述了纪念性景观符号的生成、组织，以及符号信息的传达方式，认为纪念性氛围是纪念性景观的意义所在；林凯^[14]分析了符号学与纪念性景观的深层联系，探讨了景观语义传递过程，并从语构、语义、语用角度论述了纪念性景观表达方式和原则。

2 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现状问题

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面临着来自宏观规划层面和微观景观质量层面的双重挑战。宏观层面而言，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碑空间分布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15]，并且存在规划无序、纪念体系缺位的问题^[16]。为一系列纪念碑建立联系是破局的有效途径之一。

微观层面而言，从个体景观出发，透过符号学方法进行解构分析，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以下4点问题：

1) 纪念性表达方式单一

多数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场地、纪念碑和植物（表1）。场地和纪念碑一般属于指示符号，而植物中表征祭奠或象征永恒的种类属于规约符号，相比

表1 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符号类型分析

纪念地	像似符号	指示符号	规约符号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	纪念碑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
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
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
汉中门外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	-
五台山丛葬地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
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	-
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纪念碑
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
下关发电厂死难工人纪念碑	-	纪念碑	-
太平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	松柏类植物
仙鹤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
江东门丛葬地纪念碑	雕塑、浮雕、砂石地等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纪念墙、警世钟、公祭鼎等
上新河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
汤山湖山村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
西岗头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
东郊丛葬地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园门	松柏类植物、园门
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菊花 <i>Chrysanthemum morifolium</i>
金陵大学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
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松柏类植物
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水杉 <i>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i> 、纪念碑
燕子矶遇难同胞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碑亭
花神庙丛葬地纪念碑	-	纪念碑、场地	-

一些成熟的纪念性景观案例，其景观的符号类型有待补全。景观构成模式主要为“纪念碑+植物”，纪念性表达几乎完全依赖纪念碑本身，欠缺多元符号、传达媒介联合解码的景观设计语言参与，最终导致整个场所的纪念性表达方式趋于单一。

2) 景观辨识度匮乏

符号表意“片面化”可以提高人的认知效率，同样，突出景观局部能提高人对景观的感知。很多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碑造型普通，场地规模很小，而在入口、街道界面、围护结构等局部景观设计上缺乏差异化处理和视线引导设计，造成纪念地整体景观与周边环境趋同，降低行人对纪念地的感知效率，导致景观辨识度匮乏和标志性缺失。景观辨识度会影响公众对景观的关注程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其作为城市文化载体的功能发挥。

3) 宣教功能薄弱

总体而言，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景观载体，在文化宣教功能方面是薄弱的。多数纪念地仅在纪念碑上镌刻其相关史料，而缺乏对历史的延伸与思考，以及价值观的倡导，并且也缺乏景观作为宣教媒介的介入。从符号学角度分析，文化宣教功能薄弱的直接原因在于单调的符号形式限制了景观承载的文本意义，而根本原因在于意图意义的缺位，即规划设计阶段对文化宣教功能的考量不足。

4) 传统风格缺失

现代城市景观建设追求对文脉的延续和对传统的回归，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作为民族记忆的载体更应如此。然而，它们大多数在设计上缺少对传统纪念符号的提取和运用，以及对传统园林传情方式的借鉴，

导致景观设计语言中传统风格的缺失。这与当时设计理念相对落后、文脉主义尚未得到重视有关。

因此,通过景观更新对抗不利因素的挑战,拓展景观文化影响力,是非常必要的。

3 更新方法

3.1 提炼历史信息

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更新的起点在于通过整理史料,提炼关键性的历史信息,作为象征这些事件的符号。以普德寺丛葬地为例,事件发生日期“1937.12.13”、遇难总人数“300 000”、埋葬地点“普德寺”、埋葬人数“9 721”等等均是可提取的符号。此外,引言也是重要的历史信息,它们往往可以赋予景观文化宣教的功能。在景观更新中,以景观元素为载体运用这些符号,进而使历史信息贯穿于景观的纪念性传达之中,是纪念主题符号化表达的重要途径与步骤。

3.2 突出纪念主题

激活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的标志物属性,对提升其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景观更新中应注重对外界突出纪念主题。从空间设计角度出发,应增强纪念景观空间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性,或者运用引导性的设计手法,引导视线进入场地内部;从景观构成角度出发,通过将视觉效果突出的纪念墙、雕塑小品等元素与片面化的纪念符号结合,可以有效提高景观辨识度。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端的高大雕塑是从景观元素入手提高辨识度的典型案例;东郊丛葬地纪念性景观则采用了标志性纪念符号与引导性空间设计结合的设计手法。

3.3 运用意象符号

与直观叙述历史事件的手法相对,对“战争”“荒芜”“和平”等抽象立意的艺术化表达,能够升华景观的纪念主题与文化内涵。在景观设计中,将“解释项”——抽象立意,转化为多元化的“对象”——意象,再加以精炼成为表征意象的符号;通过与景墙、铺装、植物等景观元素的结合,意象符号参与到景观构建之中,增强纪念景观的感官体验,丰富纪念主题表达。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万人坑遗址景观以砾石铺地,描绘寸草不生的意象,象征日军扫荡后的荒芜焦土。

3.4 融入传统元素

城市景观更新中应当以“提炼+创新”的方式延续传统、升华地域特色^[17]。景观设计从色彩、形式、材质入手提取传统地域特征,能够丰富景观形式,展示地域文化魅力^[18]。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更新应当通过抽象传统纪念景观符号,重塑传统纪念空间结构,融合现代景观设计与传统材料、手法,采用现代设计语言

表达传统意境等创新形式,将传统符号融入到景观之中,从而打造兼有现代风格与传统特征的独特的纪念性景观(图1)。此外,融入传统符号时应当注意形式适当、功能适用、整体效果协调,切忌脱离时代背景和实际需求^[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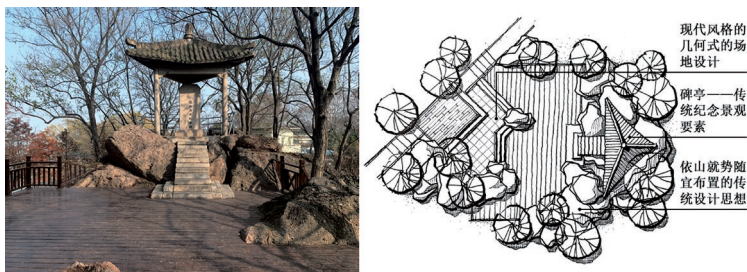


图1 燕子矶遇难同胞纪念性景观

4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性景观更新

4.1 场地概况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始建于1985年,原址位于普德村内,1997年易于现址。现址位于雨花台区共青团路西侧的一处坡地上,西面与雨花台区文化活动中心仅一墙之隔,东面坐落着著名的雨花台风景区,南北两侧用地均以居住区为主(图2)。

场地用地相对独立,与街道空间之间形成较大落差;环境郁闭度较高,与外部环境隔绝感较强;场地内外交通仅通过入口台阶联系,缺乏明显的标识,纪念碑的存在感被现状景观严重限制。场地构成要素简单,以纪念碑为构图主体,景观营造以植物造景为主,总体上景观设计介入程度尚低。在设施方面,场地景观维护情况良好,但缺乏照明设施;围护结构样式陈旧且高度较低,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4.2 更新方案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现状场地空间形态丰富,但在景观营造中未得到充分利用。案例基于现状空间开合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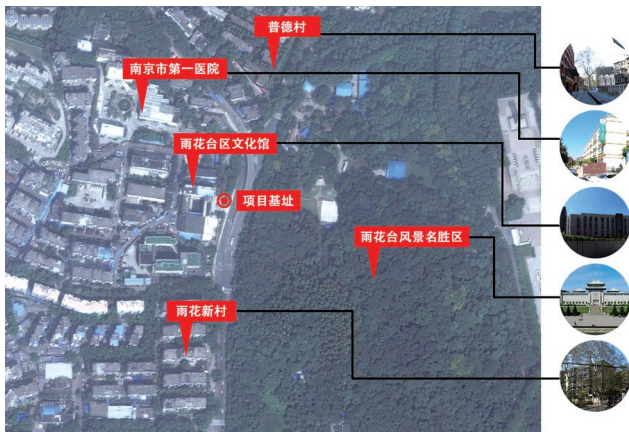


图2 场地区位

化,综合考虑场地周边环境与人车流动线的视觉效果,从标志性与引导性、纪念氛围与主题传达等角度入手,构建由“纪念性公共界面”“中部平台”和“纪念碑平台”3处集中性纪念空间组成的景观序列(图3~4)。

4.2.1 关键信息塑造标志性界面

在重新审视街道界面的空间潜力之后,用台阶座凳形式替换了原本的普通台阶,希望能够通过公共用途在公众与场地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进而吸引公众主动深入景观,了解这片土地、这段历史。正对入口的高大院墙既是劣势,也是机遇。在院墙基础上建立一座醒目的黑色纪念墙,通过简洁而突出的数字标注事件发生的时间与从葬地埋葬的人数,以一种静默的方式陈述历史,并提醒路人纪念碑的存在。

4.2.2 多元意象共建纪念空间

自纪念墙北转而上的中部平台之上,以碑亭为构图重心,形成一处景观元素集中的纪念空间。景观设计从“战争”“和平”“祈福”等多角度立意,通过符号学表达,构建具有多元化意象的纪念空间,在主题上完成从对战争的表达,到对和平的追求的转变。

1) 战争创伤

将创伤作为战争的意象,进一步在纪念墙上通过考顿钢的“裂痕”进行表达。巨大的裂痕自墙面延伸到地面,并利用原有的台阶创造错位、崩塌的感观。裂痕采用几何折线形式,顶部有一近似三角形的凸起,象征利刃。墙体的黑色、裂痕的暗红色、利刃的灰白色形成强烈对比,强化视觉的冲击感。

2) 双手合十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的形象取自“双手合十”的意象,表达为逝者祈祷的含义。碑亭中的玻璃纪念碑继承了该符号,与原有纪念碑遥相呼应。碑上的双手合十的人物剪影、背景墙体上的金属文字,两个平面上的符号通过拼贴与叠合,构成随来访者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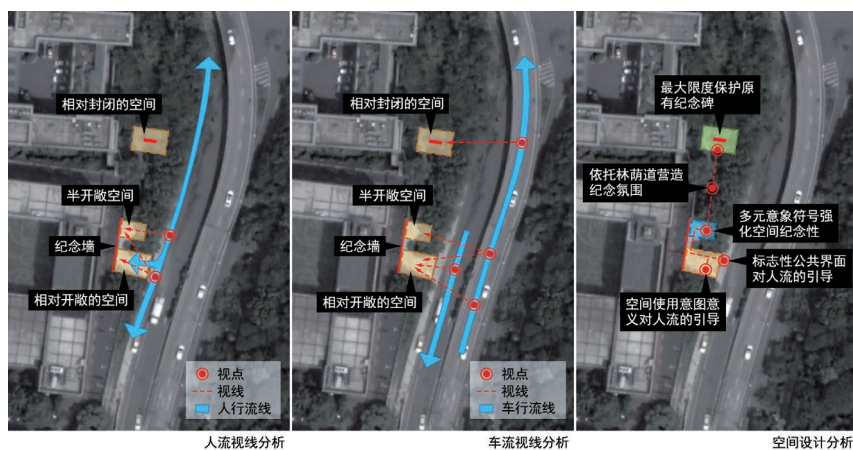


图3 空间设计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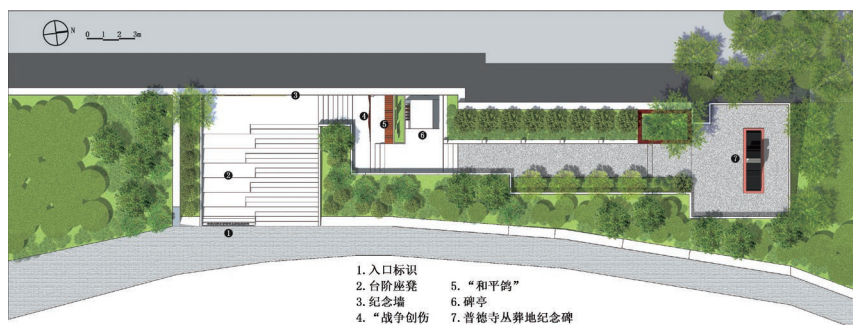


图4 总平面图



图5 碑亭“双手合十”

而变化的动态景观,传达了“牢记历史”与“珍爱和平”两层含义的纪念主旨(图5)。

3) 和平鸽

和平鸽作为和平的意象符号被运用在景观设计中。在碑亭的南侧,带

有和平鸽图案的装饰钢板错落矗立于花池之中,在草本植物的配合下,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这个景观小品在起到视觉障景效果、丰富空间层次的同时,也清晰地传达了向往和平的纪念主旨。



图6 林荫道更新前后对比

4.2.3 重构传统纪念景观序列

通过解构、重构传统陵墓景观序列,利用场地原有的空间条件,建立起涵盖起、承、转、合4个部分的纪念景观序列。“起”即场地的街道界面,衔接内外部空间;“承”为承载着纪念墙的狭长过道,形成公共性界面与纪念空间之间的过渡;“转”位于中部平台,与传统陵墓景观序列对应,建有现代风格的碑亭;“合”起于平台北部的林荫道,列植的乔木和抽象自神兽形象的几何形灯具是对传统墓道的仿写(图6),道路直通原本纪念碑所在的空间,景观序列最终收束于此。

4.3 小结

普德寺丛葬地景观构成方式简单,与周边环境缺乏联系,具有明显的纪念性表达方式单一、辨识度不足、宣教功能薄弱等特征,作为实证研究案例具有代表性。本案从现状场地条件出发,通过符号提炼与运用,结合引导性的空间设计,重塑景观标志性;运用多种意象符号丰富纪念性表达,强化宣教功能;融合传统纪念符号,营造纪念氛围。本案针对性地解决了普德寺丛葬地纪念性景观存在的问题,验证了符号学更新方法的普适性,为其他失活的丛葬地纪念性景观更新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案,具有典型意义。

5 结论

本文从符号学视角解读当前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建设情况,认为丛葬地纪念性景观主要存在纪念

性表达方式单一、景观辨识度匮乏、文化宣教功能薄弱、传统风格缺失4个方面的劣势。通过对符号学与风景园林学进行交叉研究,本文针对前述问题,提出提炼和运用历史信息,突出纪念主题,运用意象符号表达抽象立意,以及融入传统纪念符号4项景观更新方法,并结合普德寺丛葬地纪念景观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景观更新中重塑景观标志性,丰富纪念性景观构成和表达方式,以及传统纪念符号现代化表现的具体方法。

随着每年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的举行,南京大屠杀这段民族记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当下,风景园林师应当积极推进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更新,加强对纪念地的保护,提升其社会影响力,进而推动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向城市历史、民族记忆的标志物与展示窗转型。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纪念性景观象征着一段难以磨灭的血泪史,历史文化价值深厚,通过景观更新重新激活场地活力,必将使其成为传播创伤记忆、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文化标志。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自摄

参考文献:

- [1] 孙宅羲.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全纪录[J].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3, 4(4): 8-17.
- [2] 刘滨滨. 纪念性景观与旅游规划设计[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3] 孟萌. 中西纪念性园林的差异及相互借鉴融合的趋势[J]. 中国园林, 2007, 23(1): 61-65.
- [4] EVENSEN K H, NORDH H, SKAAR M. Everyday Use of Urban Cemeteries: A Norwegian Case Stud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59: 76-84.
- [5] DWYER O J, ALDERMAN D H. Memorial

Landscapes: Analytic Questions and Metaphors[J]. GeoJournal, 2008, 73(3): 165-178.

[6] 于耀洲, 于宁宁. 齐齐哈尔市近代战争遗址的现状与保护[J]. 学术交流, 2013(3): 208-211.

[7] 张洪恩, 孙旭光, 徐静. 战争遗址公园的改造与规划设计手法解读——以青岛“一战”遗址公园规划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7): 43-48.

[8] JOHN G E, CARLSON K M. 'Making Change' in the Memorial Landscape to the Dakota-US War of 1862: Remembrance, Healing and Justice through A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Dakota Commemorative March(DCM)[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6, 17(8): 1-30.

[9] 杜若菲, 王红扬, 史北祥, 等. 战争遗址纪念碑的价值评价——以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6(5): 129-135.

[10] 赵毅衡. 符号学文化研究: 现状与未来趋势[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30(12): 169-172.

[11] 赵毅衡. 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四种模式与三个阶段[J]. 江海学刊, 2011(5): 196-201.

[12] 李成佳. 符号学视角下纪念性景观语义表达方法研究[J]. 山西建筑, 2020, 46(14): 21-23.

[13] 何文秀.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纪念性景观设计研究[D]. 沈阳: 沈阳建筑大学, 2014.

[14] 林凯. 符号学视角下纪念性景观语义表达研究[D]. 北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6.

[15] 王惠. 基于身体感知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空间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 2019.

[16] 张帆, 邱冰. 南京大屠杀纪念空间调查与问题分析[J]. 建筑与文化, 2017(4): 129-131.

[17] 刘源, 王浩. 城市公园绿地有机更新的思考[J]. 城市绿地系统, 2014(12): 87-90.

[18] 徐涵, 蔡倩仪. 南粤古驿道保护修复及其文化景观设计探究[J]. 广东园林, 2020, 42(4): 42-45.

[19] 杨学成. 从设计创作角度看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特征[J]. 广东园林, 2020, 42(3): 78-82.

作者简介:

戴安康/1997年生/男/江苏苏州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南京210037)/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通信作者)刘源/1981年生/女/江苏南京人/博士/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南京210037)/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E-mail: 76881973@qq.com